



曾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终身教授, 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老年医学部与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终身教授, 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完善人口政策和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

曾毅^{1,2}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2. 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达勒姆 27710

摘要 探讨了完善人口政策和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的重要意义、必要性与可行性。模拟预测分析表明, 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而有利于减缓劳动力资源萎缩、应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等。基于“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大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 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模式既改善老年人健康, 又增强老年父母对子女的家务协助而实现老年父母与儿女“双赢”。建议尽快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 大力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 以促进国家发展和亿万家庭福祉。

关键词 人口政策; 生育决策; 代际互助

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公民的健康与幸福、社会与经济发展, 还会影响到国防安全与国际竞争力。当前, 生育率偏低、生育意愿低迷和家庭价值观逐渐弱化已成为我国人口的客观现

实, 我国人口正面临着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重心宜尽快从生育控制转向幸福家庭发展。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和科学模拟预测, 本文拟对这一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

收稿日期: 2020-12-24; 修回日期: 2021-02-05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C2000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90732)

引用格式: 曾毅. 完善人口政策和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J]. 科技导报, 2021, 39(3): 130-14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

2021.03.013

1 过去几十年和近期我国的家庭人口特征、动态与问题

1.1 人口快速老化、生育率偏低和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迷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9年发布的中方案最新人口预测,我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8.9%快速增加到2030年和2050年的16.9%和26.1%,分别为2010年的1.9倍和2.9倍^[1]。我国65+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是西方大国的2倍以上。我国最需要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弱势群体将从2010年的2000万人迅猛增为2050年的1.2亿,40年间翻六番^[2]。而且,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科技进步使更多患病老人延长寿命,将使老年人群(尤其是高龄老人)中认知和生理功能比较虚弱且需要长期照料者的比例上升^[3]。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估计我国2010年排除漏报后的总和生育率为1.63左右^[2,4],处于多数人口专家估计的1.5~1.8区间的低中端。我国政府于2015年底发布普遍允许二孩政策。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我国2016年出生数仅比2015年增长7.9%^[5];然而,2016年以后连续3年显著下降,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下降18.0%^[6]。根据各省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8年的出生率和出生人数无一例外均比2017年减少。

2017年全国样本量为25万名15~60岁妇女生育状况调查表明,我国2016—2017年育龄妇女城乡合一总和生育率为1.7(农村2.01,城镇1.48),与根据漏报可能性很小的住院分娩活产数的估计非常吻合;该调查还表明,如果没有任何生育政策限制,我国城乡合一育龄妇女实际打算生育子女数平均为1.75。受很低生育水平的城镇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结构性影响,我国城乡合一总和生育率将继续降低。上述全国数据分析和下文将讨论的赴贫困县调研及最近书面征询湖北、浙江、广东、福建和吉林等省人口社会研究以及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同志们的意见结果,都一致表明,普遍允许生育二孩政策实施5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大大低于

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意愿仍然低迷^[7-8]。

1.2 赴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灵寿县调研的启示

笔者于2019年8月下旬赴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灵寿县进行专题调研,了解了以下几方面情况并获得启示。

1) 2017—2018年出生数显著减少,包括贫穷山区的农村多数人不想生3个孩子。与2017年相比,2018年河北省全省和灵寿县出生人口数分别减少14.2%和20.0%;贫困人口占26.9%的陈庄镇出生人口数减少29.5%。据贫穷山区西庄窝村干部反映,即使政策允许,该村多数人也不想生三孩,原因在于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养育孩子成本高。

2) 计生干部们反映,有的中老年人的独生子女不幸因病或山洪车祸等天灾人祸死亡或残疾,这些失独中老年人的心理生理健康处境非常糟,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沉重负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 农村贫穷地区男光棍较多,而男光棍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低,素质差,是社会安定的大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快设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1.3 家庭价值观逐渐弱化

许多研究证明,中华民族以尊老爱幼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模式为特征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正受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9-12]:其一,西方思潮的影响致使不少青年人的家庭价值观逐渐削弱;其二,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住房条件限制等客观因素导致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远距离分离。基于1990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与1990年相比,2010年,我国1人独居户和一对夫妇2人户占总户数比例分别增长131.8%和171.8%;三代家庭户比例下降10.3%;65+岁独居老人和仅与老伴一起居住的65+岁空巢老人占65+岁老人总数比例分别增长24.3%和78.6%;与子女一起居住的65+岁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下降23.3%^[12]。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年度结婚对数和离婚对数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估算,我国一般结婚率(即某年平均每1000位15+岁无配偶者中的结婚人数)在1982—2013年有升有降呈上下波动,而2018年比2013年下降22.6%(图1);我国一般离婚率(即某年平均每

1000对夫妇中的离婚对数)在1982—1997年缓慢上升,1997—2001年处于平稳状态;然而,2002年以来却一直持续直线上升,如图2所示,2018年的一般离婚率为2002年的3.3倍。虽然目前学界对我国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影响因素的分析解释尚未达成完全共识,但都认同一点:我国的家庭价值观正在逐渐弱化^[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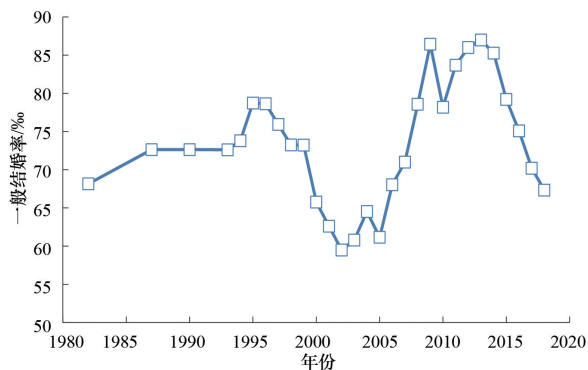


图1 1982—2018年我国的一般结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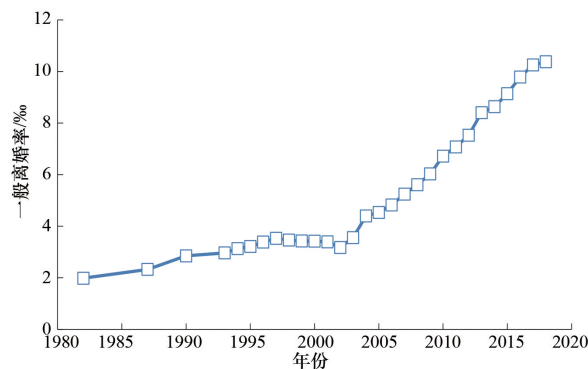


图2 1982—2018年我国的一般离婚率

我国传统家庭价值观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根基还在,并未走向全面衰落,多数青年人在总体上还是赞成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12-15]。因此,不少学者主张,基于中华千年尊老爱幼家庭价值观优良传统,只要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我国还是有可能让正在逐渐削弱的家庭价值观回归而逐步增进家庭凝聚力^[12-13]。

新加坡政府自2013年以来大力推动精心设计的“三代同堂组屋”建设,面积在120 m²左右,四居室,有老年父母、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各自的活动空

间以及两个独立厕所。新加坡政府建屋局出台实施“三代同堂优先计划”等一系列举措,为三代同堂居住家庭提供30000新元购房津贴,为紧邻居住的三代家庭提供20000新元购房津贴,鼓励成年子女和年长父母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以便于互相照应^[16],形成了尊老爱幼代际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有效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我国学习借鉴^[17]。

2 我国未来家庭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国数据分析和赴贫困县调研,以及书面征询湖北、浙江、广东、福建和吉林等省人口社会研究以及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志们意见结果,都一致表明,普遍允许生育二孩政策实施5年来我国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仍然偏低。已经有不少学者主张全面放开生育政策^[18-20],还有专家主张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21-22]。然而,大众仍然会问:如果完善人口政策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将带来的人口增长幅度以及对家庭规模结构变动的影响可能有多大?将对缓解劳力资源萎缩和应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以及促进国家发展和改善家庭福祉起多大作用?以下家庭人口预测分析和讨论将为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2.1 家庭人口预测方案的设计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完善人口政策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幅度,以及对促进国家发展和改善家庭福祉的作用,设计了A、B、C等3个家庭人口预测方案。

1) 方案A:假定2021年开始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总和生育率由2017年的城乡合一1.7增加为2021年的城乡合一1.8(增长5.6%)。

2) 方案B:假定2015年底公布的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保持不变,2021—2050年我国农村和城镇总和生育率分别保持在2017年水平不变。

3) 方案C:假定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保持不变,由于生育成本持续上升等种种原因,2021年和

2030年的城乡总和生育率分别比2017年下降2%和8%,之后保持不变。

虽然方案A和B假定2021年之后以及方案C假定2030年之后农村城镇总和生育率分别保持不变,但由于城镇人口比例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影响,A、B和C方案的全国城乡合一总和生育率分别将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1.66、1.55和1.42。

基于上述A、B、C不同方案的参数假设,应用由我国学者创建、在国际国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的ProFamy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及软件(www.profamy.com.cn)^[23],进行家庭人口预测分析。ProFamy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概述以及0岁期望寿命、未来城镇人口比例和其他参数的估测及假定见文献[24]的附录。

2.2 不同方案对人口总数、劳动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分析

不同方案的家庭人口预测表明,如果从2021年开始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取得良好效果(方案A),我国将在2030年达到14.45亿的人口总数峰值,然后平缓下降到2050年的13.74亿(图3)。显然,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而在生育水平更低的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B和C方案下,我国的人口峰值将分别达到14.34亿(2028年,B方案)和14.29亿(2027年,C方案),随后较快下降,2050年时分别为13.45亿(B方案)和13.19亿(C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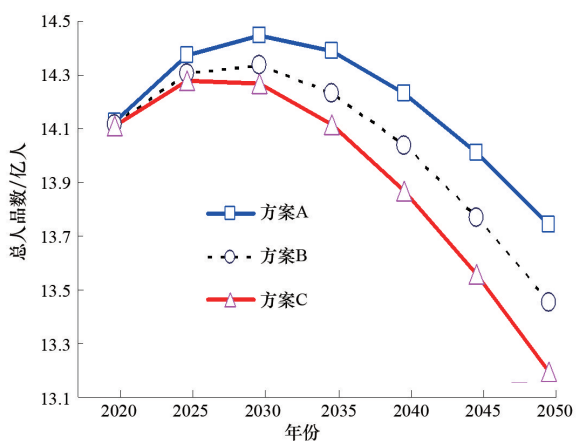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方案下的总人口

我国18~64岁劳动力数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以较快速度下降,2035年之前劳动力数量变化模式在A、B、C这3种不同方案下并无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新生儿童必须在18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年龄。但是,在很低生育水平的B和C方案下,203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10年分别减少6243万和6837万,造成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在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的A方案下,2035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下降速度将比B、C方案显著减缓(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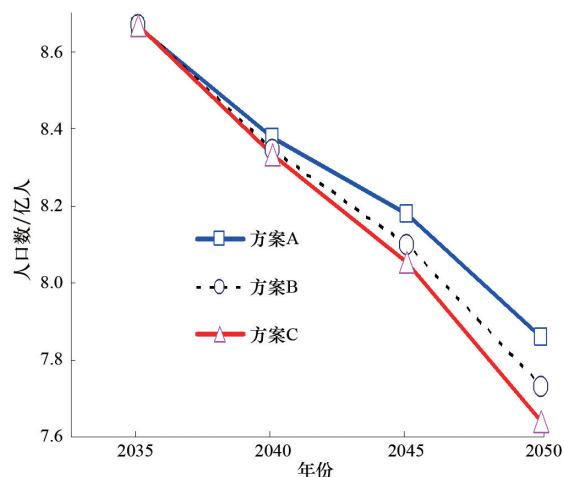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方案下的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

在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的方案A下,我国2050年总人口分别比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很低生育率方案B和C相对增加2900万人(增长2.2%)和5500万人(增长4.2%)。然而,这并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基于以下概述的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客观事实。

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摒弃了自我封闭和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系,改为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同时,由于人口惯性作用,我国2018年总人口比1978年增长45.0%;然而,扣除物价因素后的2018年全国人均GDP是1978年的25.3倍,2018年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是1978年的24.8倍;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由于人口惯性,我国

经历了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但经济发展速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快于改革开放之前。如何解释这些与马尔萨斯人口分母决定论完全背道而驰的客观现实?林毅夫^[25-26]和蔡昉、王德文^[27]等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人多成了社会的负担。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力多而便宜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巨大需求外,还远销海外国际市场,价廉物美很有竞争力。因此,在如今生育率大大低于替代水平的市场经济新时代,生育水平提高一点和人口增加一些就不是社会负担,而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25-28]。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仍然保持增长,但已面临劳动力供不应求和成本不断上涨的严峻挑战。根据蔡昉^[29]和田巍等^[30]的研究,我国的蓝领工人工资在2004年之后呈现指数级增长,并在2010年左右到达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刘易斯转折点。我国目前的劳工成本是孟加拉、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4~5倍,更是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10倍左右,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的用工困境。所以,我国目前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并没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也不得不大规模转移到其他亚非国家,对我国工人的就业造成压力。归根到底,这是由于劳动力资源不足造成的。

很低生育水平的B和C方案下劳动力资源加速萎缩,除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资源的严重负面影响外,还将造成未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的青中年人数大减,但领取退休养老金的老年人群仍然庞大并快速增长,使退休金缺口问题日趋严重,危及社会稳定。显然,如果我国尽快完善人口政策,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的A方案,将会因人口总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多一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3 不同方案对人口老化影响的比较分析

在很低生育水平的B和C方案下,还将产生老

年人口和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空巢老人比例偏高(图5、图6)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金赤字及社会保障困难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在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的A方案下,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虽然也将持续上升,但比B和C方案减缓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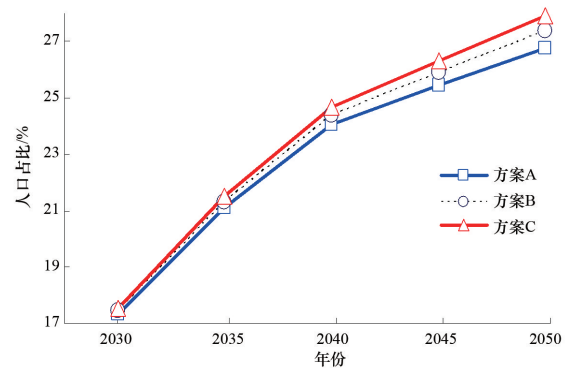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方案下65+岁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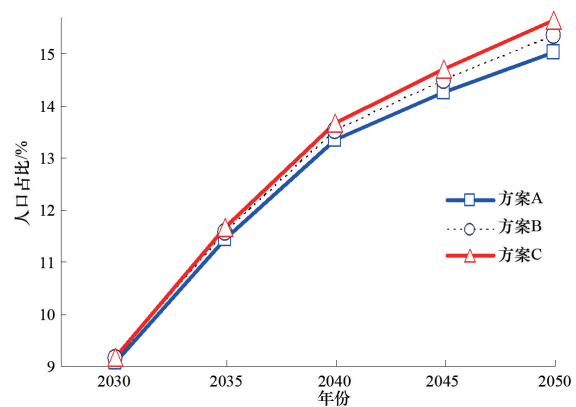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方案下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3 完善人口政策对我国应对灾害突发事件和国泰民安的影响

3.1 有助于应对流行病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的严峻挑战

世界各国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和死者中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年人,而且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的国家,老年人占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和死者的比例以及患者总死亡率越高,因为老年人免疫力较低且多合并慢性疾病,更容易导致重症和死亡。例如,截至2020年4月20日,中国84250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中,累计死亡4642人,总死亡率为55.1%^[31];中国新冠病毒肺炎死者中81.0%为60+岁

老年人^[32]。意大利和西班牙因为多年来生育率很低而人口老化十分严重,2020年初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比中国高出94.7%和66.9%^[1],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病毒肺炎死者中,60+岁老年人占比分别为95.1%和95.3%,分别为60岁以下人群的16.3和19.7倍^[33]。严峻的客观事实清楚地表明,老年人群免疫力弱,很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在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时面临的风险和受到的冲击越大。

根据我国2010年生命表估算,在一般正常情况下,独生子女在其母亲45、80、85、90岁之前死亡的平均概率分别约为4.0%、11.6%、15.5%与21.4%^[34]。而在地震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以及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中,中老年夫妇子女死亡比例则要比正常情况下高得多;而只有一个子女、已无再生育能力的中老年夫妇一旦其独生子女死亡,则成为心理生理健康非常脆弱的无子女老人,为社会和个人带来沉重的负担,独生子女的意外死亡给父母造成的长期性心理打击和健康损伤是难以估量的。毫无疑问,无子女老人是典型的高风险人群,而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二孩将显著降低未来无子女老人高风险人群比例,有效提高我国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暴发和地震等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完善人口政策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提高生育水平,避免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切实推进健康老龄化。这也是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的重要中长期对策之一。

3.2 有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青年发展,避免独生子女偏多对国防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和世界各国研究证明,与独生子女的心理缺陷形成鲜明对照,日常生活中兄弟姐妹间无数的交流机会能够促进儿童心理发展、身体健康和成年以后的发展^[35-36]。研究发现,兄弟姐妹互助合作,有效地降低因提供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还有利于充分利用更多的家庭和社会网络资源,促进职业发展和改善生活质量^[37-38]。因此,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将有助于儿童健

康成长和青年发展。

许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以及增加征兵难度^[39-41]。因此,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将减少独生子女数量和比例,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太多对国防安全的严重负面影响^[34]。

3.3 缓解数千万“剩男”找妻难和避免“四二一”畸形结构家庭过多等现象

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年发布的报告所述,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使我国在2020、2030和2040年婚龄男性比女性分别多出大约3000万、4000万和4800万^[42]。如果我国生育水平继续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更年轻的年龄组人数大大少于老年年龄组,比相同年龄女性“多”出的数千万“剩男”们到更年轻女子中找到妻子的概率继续大大下降,势必加剧众多“剩男”找妻难^[43],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如果多数人只生一孩,那么一定形成无数一对中青年夫妇照护4位老年父母的“四二一”畸形家庭;随着寿命延长,今后更多中青年夫妇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在世,家庭养老压力将更大。毫无疑问,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生育二孩可以避免形成过多“四二一”畸形结构家庭及其所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重压,并缓解未来数千万“剩男”找妻难的大问题。

3.4 有助于形成老年父母与儿女“双赢”的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控制相关协变量后,与空巢老人相比,和子女同住或紧邻居住的老人认知功能显著改善40%,自评健康良好可能性明显升高32.4%,生活满意可能性大幅提高54.8%。其解释是:子女与老人经常互动交流有效延缓老人认知功能衰退,并避免老人因孤独空虚引发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而显著改善心理和生理健康^[44]。国外学者对芬兰、意大利和荷兰老年人的研究亦有相似发现^[45]。目前虽然没有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康复和死亡老人家庭结构及居住安排数据而无法进行详细

实证分析,但是根据上述“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完全有理由推断,与无子女或远离子女的老人相比,和子女同住或紧邻居住的新冠病毒肺炎老年患者死亡率更低而康复率更高,子女的就近照护和精神慰藉将发挥药物治疗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分析还发现,与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的居家人均照料现金支出比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人低 40.4%^[46];相对与父母分隔较远居住,与父母一起居住或紧邻居住的女性其家务时间每周减少近 10 h,就业率增加 23.1%,自评健康良好可能性上升 19.8%;而男性每周工作时间增长 6.2 h^[47]。显然,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模式既改善老年人健康,又有效增强父母对子女的家务协助,从而促进子女的就业和工作时数,可实现老年父母与儿女互助“双赢”^[44-48]。

但是,如果今后很多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即使不切实际地假设未来所有独生子女都能与老年父母一起或紧邻居住,那么还会有一半的老年父母因为子女的短缺而不得不“空巢”。因此,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胎及代际互助家庭模式,将使老年人和子女“双赢”可能性大大提高。

4 完善人口政策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综合实力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 2019 年公布的中方案人口预测,我国 65+ 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 2035 年后将显著超过美国,在 2041 年后将显著超过英国^[1](图 7)。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 2010 年高于美国 10.7% 逆转为 2050 和 2060 年分别低于美国 1.4% 和 5.7%^[1]。

21 世纪我国的最大国际竞争者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是印度。根据联合国人口司 2019 年公布的中方案人口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将由 2010 年比印度高 18.9% 变为在 2050 与 2060 年分别比印度低 10.8% 与 14.5%,老人加少儿总抚养比由 2010 年比印度低 34.8% 变为 2050 与 2060 分别比印度高 41.7% 与 50.0%;2050 年与 2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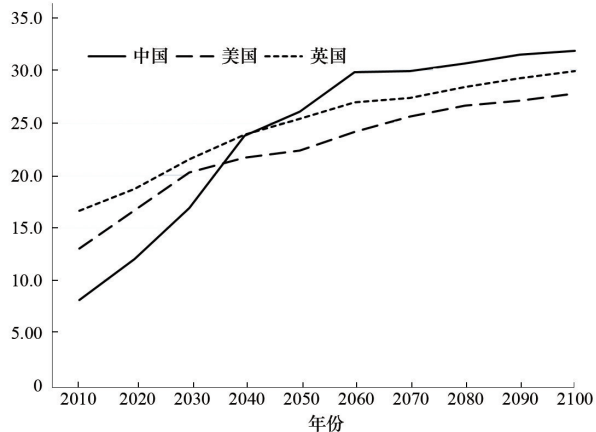


图 7 2010—2100 年,中国、美国和英国 65+ 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1]

年,我国 65+ 岁老人比例分别等于印度的 1.9 倍与 1.7 倍,80+ 岁高龄老人比例分别等于印度的 3.2 倍与 2.7 倍^[1]。

联合国人口司 2019 年中方案人口预测假定我国总和生育率由 2015—2020 年的 1.69 (比美国低 5.1%,比印度低 24.6%) 增加到 2050—2055 年的 1.75^[1],显著高估了我国未来的生育水平,其原因在于联合国人口司的人口预测没有区分农村和城镇人口,忽略了快速城镇化带来低生育水平的城镇人口比例大幅升高而导致城乡合一总和生育率结构性下降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我国继续长期保持当前很低的生育水平,今后与美国印度等大国对比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综合实力将比联合国人口司中方案预测更为严峻。

近年来,美国鹰派发动了多轮针对我国的贸易战。根据余淼杰的研究^[49],如果我国在采取同等力度反制美国贸易战的同时,充分发展国内生产和消费以及扩大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则可以使损失最小化;其中最重要的支撑是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要求我国必须避免劳力资源快速萎缩和保持稳定适度的人口增长以促进生产与消费市场发展。

美国反华鹰派对我国的现行生育限制政策不再攻击,反而乐观其成,利用我国人口严重老化与劳力资源趋于萎缩等试图唱衰中国。显然,继续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限制生育导致劳力资源加快萎缩等许多弊端,正中西方反华势力的下怀,极不利于

我国应对美国鹰派挥舞贸易战大棒试图遏制我国发展的严峻挑战。

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人口政策数据库表明,全世界有55个国家实行包括延长带薪产假、增加托儿补助并按生育数量发放奖励补贴等旨在提高生育水平的鼓励生育政策,其中有27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显著高于我国^[50]。俄罗斯普京总统2020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51],一开场用了长达5页篇幅讲述俄罗斯必须和如何鼓励生育。他说,俄罗斯于2007年起实施的为生育2个和更多孩子家庭提供补贴的“母亲资本”计划,使俄罗斯生育率显著提高到2019年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1.5个孩子,但是还不够,必须继续鼓励和提高生育率,实行全国平均每个孩子从出生到3周岁领取国家发的每月超过11000卢布(折合人民币1241元)补贴,将每个孩子享受“母亲计划”补贴金额增加15万卢布(折合人民币1.69万元);从2020年1月1日起,在加强补贴3岁以下儿童同时,另外增加每月向3~7岁孩子给予资助。普京总统一再强调,必须跳出人口陷阱,使俄罗斯在2024年生育率达到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7个孩子目标^[51]。为了鼓励生育,多年来生育水平显著高于我国的美国家庭每年可以根据未成年孩子个数获得免税额;美国政府在2019年新修订的税法中将每名儿童的税收抵免税额(child tax credit)由10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52]。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新加坡万事俱备,只缺一,那就是下一代人数不够”。他希望国人再接再厉,多多生育,新加坡政府近年推出多项措施鼓励生育^[53]。为了扭转低生育率趋势,日本和韩国相继加大了鼓励生育的力度。据2021年1月7日人民网报道,日本东京都政府日前决定,从新的一年开始,将在国家提供的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68万元)生育补助金的基础上,再额外追加提供一份生育补贴,给每名新生儿提供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384元)的补贴。韩国政府最近也发布了“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将从2022年起,向有0~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育儿补助,并在2025年逐步上调至每月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00

元)。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的生育补贴。韩国的这一新政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5 家庭人口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1) 尽快实施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在对城乡所有新生孩子实行法律和相关社会福利政策规定的带薪产假、生殖健康服务、婴幼儿保健,制止因生育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以及实行弹性工作制等前提下,因地制宜对生育第二孩育龄夫妇提供适当减免税收、增加带薪产假、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托儿服务优惠等额外补贴措施,以鼓励更多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建议让人口计生干部们从限制人们生育征收“超生”罚款等不受百姓欢迎事务中解脱出来,改为集中精力做好卫生防疫、生育健康和老龄服务等利国惠民之事。

2) 大力加强和改善妇产科、儿科、学前教育和生育健康管理等当前急需专业人才的培训和配套设施建设,使之适应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和鼓励二孩的需要。

3) 加强和改善宣传报道,对于当前客观存在的生儿育女成本太高等困难,多从正面角度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加强关于对养育孩子超高成本投入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科学道理的宣传教育,通过社会和互联网宣传培训等各种渠道努力倡导节俭而高效养育孩子的科学途径。建议相关政府部门统一规范,对各种名目繁多的学前和课后辅导培训收费标准制定适当上限;教育部门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学前和课后辅导培训每周小时数上限予以规范,避免因超量课外辅导培训对孩子们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并使家长们负担过重而费力不讨好的“愚蠢”结果。

4) 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同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家庭养老优良传统,尽快出台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优惠政策;对于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或紧邻居

住家庭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包括:在购买和租用政府补贴住房时,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和住房购置税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保障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成年子女休假和请假照顾老人的权利;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加强中华文明传统尊老爱幼、兄弟姐妹和亲友邻里和谐互助博爱的家庭社会价值观教育。建议举办分别针对年轻父母和老年祖父母的“如何引导儿童健康成长”培训班和宣传活动,改变年轻父母和老人们纵惯“小皇帝”的不良习俗,并掌握培育孩子健康成长的科学方法。

5) 建议推进可以相对独立的老人与子女三代同堂或紧邻居住的复式单元公寓房的房地产发展,以利于解决老人与子女、孙子女在饮食、起居、电视娱乐等偏好差异可能引发的代际矛盾,使老人和晚辈生活更加幸福愉快。积极鼓励支持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或近邻居住,既鼓励老人向子女提供照料孙子女等家务帮助,又有利于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在生病时得到适当家庭照料,促成老人和晚辈代际互助“双赢”。建议对子女选择与父母自愿一起居住或紧邻居住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购房优惠;先从局部试点地区做起,再逐步推广,努力创造老人与子女及孙子女良性互动的社会氛围,促进代际互助与幸福家庭发展。

6) 赞助鼓励老人与已婚女儿女婿一起或紧邻居住的宣传和试点。“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大样本数据分析表明,与成年儿子相比,女儿孝敬父母指数显著更高、与父母情感关系也显著更好;同时,老年父母对于女儿女婿照料的满意度显著比儿子儿媳好^[54-55]。因此,建议鼓励赞助老人与已婚女儿女婿一起或紧邻居住的宣传和试点,逐步改变我国“外嫁女儿”的传统旧习,彻底摒弃重男轻女观念。

我国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重心宜尽快从生育控制转向幸福家庭发展。当然,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只是应对人口老化严峻挑战的对策之一。同时,建议尽快逐步提高退休年龄^[56],继续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全面深入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使广大农民从年轻时即承担相应的参保缴费义务,年老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个人账户加政府补贴的社会养老

保障待遇,消除养儿防老后顾之忧,并为铲除重男轻女传统陋习奠定经济社会基础^[57]。

致谢: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以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分析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武云秀、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李岚和河北省统计局郭洪波对赴河北贫困地区调研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森杰提供了完善人口政策对反制美国鹰派针对中国贸易战作用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浙江大学何文炯、湖北大学石智雷、中南师范大学张华初、吉林大学李雨潼和复旦大学沈可等在各省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各地生育率变化信息收集中给予了支持帮助,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正联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旻晖、姚尧、杨涵墨、郑靖治和郭牧琦进行了研究协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9 revision[EB/OL]. [2020-12-10].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Probabilistic/Fertility/>.
- [2] 曾毅. 尽快实施城乡“普遍允许二孩”政策既利国又惠民[J]. 人口与经济, 2015(5): 115-126.
- [3] Zeng Y, Feng Q, Hesketh T, et al. Survival, disabilities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among the oldest-old in China: A cohort study[J]. *Lancet*, 2017, 389(10079): 1619-1629.
- [4] 曾毅. 尽快启动普遍二孩软着陆,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均衡发展[M]//中国人口年鉴201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7-02-2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 [6]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02-28) [2020-12-1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 [7] 梁建章, 黄文政. 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EB/OL]. (2019-04-15). <https://money.163.com/19/0415/16/ECQNK20C00258J1R.html>.
- [8] 黄匡时. 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国家卫健委专家这样说[EB/OL]. (2019-01-02). <http://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190102128453.html>.
- [9] 丁文. 论文化转型中家庭观念的变革[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2): 155-159.
- [10] 史秉强. 代际之间责任伦理的重建[J]. 河北学刊,

- 2007, 3(4): 64-67.
- [11]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 中国学术, 2001, 4: 47-51.
- [12] Zeng Y, Wang Z. Dynamics of family households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1990-2010[J].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 2(2): 129-157.
- [13] 杨善华.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1, 48(2): 150-157.
- [14] 李银河. 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基于兰州的调查[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1): 6-12.
- [15] 徐安琪. 家庭价值观的变迁特征探析[J]. 中州学刊, 2013(4): 75-81.
- [16] 杨丹旭. 成熟组屋区将建三代同堂单位,当局也考虑奖励多代人到新镇同住[N]. 联合早报, 2014-07-17.
- [17] 梁燕君. 新加坡家庭养老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EB/OL]. (2014-01-14). <https://www.fx361.com/page/2014/0211/6368053.shtml>.
- [18] 乔晓春. 一孩政策后果的历史审视[J]. 学海, 2016(1): 52-61.
- [19] 于长永, 刘二鹏, 代志明.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J]. 人口学刊, 2017, 39(3): 5-20.
- [20] 吴顺军, 马慧芳. 关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探讨[J]. 新西部, 2019(4): 10-11.
- [21] 梁建章, 黄文政. 中国出生人口四连降毫无悬念,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迫在眉睫[EB/OL]. (2021-01-2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837053361896463-&wfr=spider&for=pc>.
- [22]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全面二孩后反而出现生育断崖,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EB/OL]. (2021-02-03). <https://news.ifeng.com/c/83XOUP6U7XQ>.
- [23] Zeng Y, Land K C, Gu D, et al. Household and living arrangement projections: The extended cohort-component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S. and China[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er, 2014.
- [24] 曾毅.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并鼓励二孩,促进国家发展和家庭福祉[EB/OL]. (2018-10-15). <http://nsd.pku.edu.cn/sylm/gd/257979.htm>.
- [25] 林毅夫. 经济发展战略、老龄化与人口政策[M]//曾毅, 等. 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26] 林毅夫. 经济发展战略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M]//曾毅, 顾宝昌, 梁建章, 等. 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1.
- [27] 蔡昉, 王德文.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劳动贡献[J]. 经济研究, 1999(10): 62-68.
- [28] 梁建章, 李建新. 中国人太多了吗?[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9]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6): 125-137.
- [30] 田巍, 姚洋, 余森杰, 等. 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J]. 经济研究, 2013(11): 87-99.
- [31] 中国疾控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分布[DB/OL]. (2020-04-20). <http://2019ncov.chinacdc.cn/2019-nCoV/>.
- [3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0, 41(2): 145-151.
- [33] Worldmeters. COVID-19 coronavirus pandemic [EB/OL]. (2020-04-20).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 [34] 曾毅. 鼓励生育二孩利国益民并有助于粮食安全[J]. 科技促进发展, 2018, 14(1): 7-16.
- [35] 陈英和, 姚端维, 郭向和.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3): 56-59.
- [36] Mosli R H, Kaciroti N, Corwyn R F, et al. Effect of sibling birth on BMI trajectory in the first 6 years of life[J]. Pediatrics, 2016, 137(4): 2015-2456.
- [37] 陈璐, 范红丽.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6, 40(3): 71-81.
- [38] Zhang Q F. The strength of sibling ties: Sibling influence on status attainment in a Chinese family[J]. Sociology, 2014, 48(1): 75-91.
- [39] 张理义, 仲爱芳, 孔令明, 等. 不同年代军人适应不良状况的差异: 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3, 40(2): 69-73.
- [40] 衣新发, 赵倩, 蔡曙山. 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横断历史研究: 1990—2007[J]. 心理学报, 2012, 44(2): 226-236.
- [41] 孙燕平, 孟永霞, 韩维红, 等.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军人心理素质及性格特征的差异分析[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15, 33(6): 664-665.
- [4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 [43] 曾毅.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有利于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J]. 社会科学, 2009(8): 54-59.
- [44] 沈可, 程令国. 空巢是否损害了老年健康?[J]. 世界经济文汇, 2012(2): 89-103.
- [45] van Gelder B M, Tijhuis M, Kalmijn S, et al.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situation during a 5-year period are associated with a subsequent 10-year cognitive decline in older men: the FINE Study[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4): 213-219.
- [46] 曾毅, 陈华帅, 王正联. 我国21世纪上半叶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分析[J]. 经济研究, 2012, 47(10): 134-149.
- [47] 沈可, 鄢萍, 章元.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 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J]. 人口研究, 2012(5): 15-27.

- [48] 曾毅, 胡鞍钢. 整合卫生计生服务与老龄工作, 促进亿万家庭福祉[J]. 人口与经济, 2017(4): 36-42.
- [49] 余森杰. 余森杰谈中美贸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50]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5. Database[DB/OL]. [2020-12-10]. https://esa.un.org/PopPolicy/about_database.aspx.
- [51]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0 年国情咨文全文: 苏联解体后, 我们仍然有同样的雄心壮志[EB/OL]. (2020-01-19) https://m.guancha.cn/f-putin/2020_01_19_532168.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52] 美国国家税务局. The child tax credit benefits eligible parents[EB/OL]. (2019-10-09). <https://www.irs.gov/newsroom/the-child-tax-credit-benefits-eligible-parents>.
- [53] Jones G W, Hamid W. Singapore's pro-natalist policie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y worked? [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5: 33-61.
- [54] Zeng Y, Linda G, Melanie S, et al. Older parents enjoy better filial piety and care from daughters than sons i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2016, 3(1): 244-272.
- [55] Zeng Y, Sereny M, Gu D, et al. Older parents benefit more in health outcome from daughters' than sons' emotional care in China[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016, 28(8): 1426-1447.
- [56] 曾毅. 中国人口老化, 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 经济学(季刊), 2005, 4(3): 1043-1066.
- [57] 曾毅.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一体工程——计生系统面临的历史性机遇[J]. 人口研究, 2001, 25(6): 75-77.

Improving population policy and promoting family patterns of respecting the aged, caring for the you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ZENG Yi^{1,2}

1.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27710, USA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mproving population policy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family pattern of respecting the aged, caring for the you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Our scientific analyses show that the policy of returning the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to families and encouraging the second birth would not lead to over-growth of population. On the contrary, such policy improvements would be helpful to slow down the quick shrinking of labor resources, face the serious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so on. Our empirical analyses on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datasets demonstrate that family pattern of three-generations living together or living nearby may not only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household assistance by older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to realize the "win-win" outcome. Based on our solid scientific research, we suggest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turning the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to families and encouraging the second birth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uggest to promote the family pattern of respecting the aged, caring for the you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to facilita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ell-being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milies.

Keywords population policy;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



(责任编辑 王丽娜)